

艾丽斯·沃克《梅丽迪安》中的 “物”叙事



程秋月, 彭石玉*

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摘要:《梅丽迪安》采用“百纳被”式的叙事手法, 主要讲述了美国民权运动背景下黑人女性梅丽迪安从被压迫到奋起反抗的人生历程。小说中充满了对“物”的描写, 这些“物”深度参与了梅丽迪安自我重塑的过程。本文基于物叙事理论, 立足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 聚焦小说中“蛇形土丘”、“寄居者树”、“坦克”、“蓄水池”、“黑人教堂”等关键物象, 旨在考察“物”在黑人女性梅丽迪安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叙事功能与能动力量。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 首先, 分析“物”的文化符号功能, 揭示其承载的种族压迫历史与族群苦难记忆; 其次, 探究“物”的主体性, 阐明“物”并非被动背景, 而是以自身能动性激发并推动梅丽迪安在民权运动中进行现实反抗; 最后回归“物”的本体实在性, 论证“物”以真实可感的物质存在, 促使梅丽迪安完成了彻底的精神觉醒与身份重构。而通过剖析文本内部的“物—人”互动关系, 不仅揭示出“物”在黑人女性成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推动意义, 也可为当今世界上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所面临的种族不平等等困境提供新的阐释话语。

关键词: 艾丽斯·沃克; 《梅丽迪安》; 文化符号; 主体性; 实在性

DOI: [10.57237/j.ssr.2026.05.001](https://doi.org/10.57237/j.ssr.2026.05.001)

On the Narrative of "Things" in Alice Walker's *Meridian*

Cheng Qiuyue, Peng Shi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Meridian* employs a "patchwork quilt" narrative technique, recounting the life journey of the Black woman Meridian from oppression to resistan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e novel abounds with descriptions of "things," which participate deeply in the process of Meridian's self-remaking. Drawing on thing narrative theory and employing close reading as its research method, this paper focuses on key object-images in the novel, such as the "Sacred Serpent," "The Sojourner," the "Tank," the "Reservoir," and the "Black Church," with the aim of examining the narrative functions and agency that "things" exert in the growth of the Black woman Meridian. The study unfolds along three dimensions. First, it analyzes the cultural symbolic function of "things," revealing how they bear the history of racial oppression an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ethnic suffering. Second, it explores the agency of "things," elucidating that rather than serving as passive background, they actively stimulate and propel Meridian's real-life resistance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rough their own agency. Finally, it returns to the ontological reality of

基金项目: 武汉工程大学第十七届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 (No. CX2025515).

*通信作者: 彭石玉, pengshiyu@wit.edu.cn

收稿日期: 2026-07-16; 接受日期: 2026-08-17; 在线出版日期: 2026-09-07

<http://www.socscires.com>

"things,"demonstrating that as tangible material existences, they prompt Meridian to accomplish a thorough spiritual awakening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By analyzing the "thing-human"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text, this paper not only reveals the undeniable propelling significance of "things" in the growth of a Black woman, but also opens up a new interpretive discour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edicament of racial inequality and other adversities faced by Black people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Keywords: Alice Walker; *Meridian*; Cultural Symbol; Agency; Realism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后人文主义”、“物转向”思潮来袭,“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逐渐被打破,“物”的地位逐步凸显出来。在文学领域中,文学作品中的物人关系、物参与“文化与社会意义建构”[7]等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 1944-)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非裔女作家,擅长将“物”放入故事以达到叙事的目的[15],在《梅丽迪安》(*Meridian*, 1976)中,黑人女性梅丽迪安的成长过程充斥着大量的“物”,文学作品中意义世界的形成与对物的讲述大有关系,对物的轻视导致我们读不懂许多与物相关的叙事[5]。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小说的种族斗争、妇女主义精神和叙事手法等,这些研究本质上还是将“人”作为叙事的中心,鲜有学者关注作品中“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物”是广义性质的,不仅包括无生命物件,也包括有生命的动物、植物、超自然物和人类身体等,甚至还包括事件和各类人造物[10],各类物通过作为“文化符号”、“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以及超越语言文化的“本体存在”发挥作用[13]。因此,本文基于物叙事理论,从“物”的文化符号功能、主体性、实在性三方面,先是探讨”物“长久以来所承载的压迫历史,进而分析黑人女性梅丽迪安通过“物”的驱使在民权运动中所做出的一系列反抗行为,最终落脚于“物”以本体实在促使梅丽迪安完成最终觉醒,以此揭示“物”在梅丽迪安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为当今世界上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所面临的种族不平等等困境提供新的批判话语。

2 蛇形土丘与旅居树：种族压迫

作为符号的物试图揭示物指向的社会、文化内涵和主客体关系,这就必然使研究进入历史、文化维度[10]。小说中的蛇丘和旅居树两个物象承载着特定阶段的历史,塑造着黑人女性梅丽迪安的生存环境。

在《梅丽迪安》中,蛇形土丘并不仅仅是供给家庭

生活的农耕土地,它蕴含着印第安人原住民和黑人的双重创伤,折射出白人种族主义的残忍行径。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西进运动”便拉开了帷幕,这场运动不仅是将美国边疆定居地带持续向西推进的过程[6],更是美国通过武力扩张吞并土地的侵略行为:白人居民向西部迁徙,武力侵占印第安原住民的部落,把他们从赖以生存的土地上赶出去,甚至大规模屠杀原住民,妇女儿童无一幸免,整个印第安民族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小说中梅丽迪安年幼时,父亲日常耕作的蛇形土丘便是印第安人故土的缩影,“这座土丘埋满了印第安逝者”[3],可以窥探出白人种族的侵略痕迹。同样深受白人族群压迫的梅丽迪安的父亲始终心怀愧疚,认为自己不应该占有这片土地,一心想着将土丘归还给印第安后代,而尽管印第安人沃尔特(Walter)后来又将土地物归原主,但最终还是被白人权威所裹挟,“三名白人男子开着政府配发的卡车来到农场.....通知说第二天推土机就会进场。圣蛇印第安墓葬土丘.....都要被改造成旅游景点——一座城市公园”[3]。白人政府丝毫不考虑黑人的切身利益,任意妄为,而在美国民权运动时期,白人政府经常以“公共用途”为由无偿且随意征收黑人所有的土地,实则为了清除黑人社区、剥夺黑人世代地产。将“土丘”改造成“城市公园”,白人试图从根本上削弱黑人平权抗争的力量,黑人对此毫无招架之力,当梅丽迪安的父亲前往县法院伸张正义时,得来的却是“不得踏入圣蛇公园”“不再对有色人种开放”[3]更为无理的要求。“蛇形土丘”这个物象见证了印第安人和黑人深受白人种族压迫的历史,梅丽迪安作为黑人的后代,必将承受来自白人族群持续的伤害。

生长在撒克逊学院的“旅居树”并不是普通的自然之物,它承载着黑人奴隶路维尼的历史传说,是黑人苦难命运和白人私刑暴力的象征。萨克逊学院原本是萨克逊种植园,路维尼从西非被卖到此地当奴隶,却因讲恐怖故事吓死了白人奴隶主家的幼子,而美国从殖民

统治开始，白人至上主义便是常态[1]，黑人在白人面前完全没有人权所言，而长久以来的压迫也导致了黑人丧失了反抗能力，因此白人奴隶主将路维尼的舌头割下来，甚至在地上反复碾磨来发泄自己的愤怒，黑人奴隶路维尼由此彻底丧失了话语权。白人奴隶主此种残暴的私刑行为并非一时兴起，它在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私刑是系统性种族暴力的核心表现，被白人用来教训他们眼中有罪的黑人，以此维护白人中心主义[4]，路维尼无意致使幼子死亡挑战了白人权威，她在白人眼中是有罪的，就会遭到残酷的报复，而白人奴隶主的行为不仅直接导致了路维尼的悲惨命运，同时也印证了种族主义的暴虐。至此，“旅居树”不仅是个体境遇的映照[8]，它也成为往昔黑人集体肉身受难、生命被肆意剥夺的历史纪念碑，“这棵树能开口说话、奏响乐章”[3]也象征着黑人苦难的延续。梅丽迪安借由“旅居树”了解到先辈的苦难，也折射出自身的艰难处境，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时期，种族压迫甚嚣尘上，整个南方笼罩在白人的控制之下，黑人的投票权被剥夺，无法发声来捍卫自身的基本权益。

木兰树和蛇形土丘作为自然之物的本质属性退场，物的“文化符号”功能得以彰显。两者背后承载的创伤历史都归因于白人种族压迫，这给梅丽迪安乃至整个黑人族群塑造了一个举步维艰的生存环境。

3 坦克与蓄水池：现实反抗

在文学作品中，“物”长久以来都是作为衬托“人”的客体而存在，一般充当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工具。而拉图尔和简·本妮特在内的理论家都认同“物”有生命，与人一样具有能动的力量，能够影响人物作出重大改变甚至操控人物的行为，从而推动叙事的进程[14]。坦克和蓄水池共同构成梅丽迪安进行现实反抗的核心要素，通过发挥“物”的主体性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坦克”是白人小镇居民为了对抗民权运动者而购买的，自20世纪60年代就一直停在齐柯克马（Chicokema）小镇的公共广场。“坦克”本身是静态的军用物品，但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以实物暴力试图恐吓和压制着黑人社区的居民，使其沉寂在白人族群压迫下的种族环境中。社区的黑人孩童因想要观看“木乃伊女人”展览惨遭拒绝和侮辱，基本权利被剥夺，梅丽迪安为了捍卫黑人的基本权益，带领着一群孩子在广场游行示威。面对梅丽迪安的行为，“坦克引擎骤然轰鸣，夸张地左右摇摆，像在戏谑挑衅，最终稳稳对准她的胸

口”[3]，原本静止不动的“坦克”从故事的背景中脱颖而出，与梅丽迪安建立了直接联系，它成为了一个有行为的主体，充满敌意，试图通过自身物理上的震慑来吓退甚至吞噬梅丽迪安，制止其自不量力的行为，此刻“坦克”这个人造物不再是一堆金属，而是成为了一个有意图的对手。面对“坦克”的挑衅，梅丽迪安根本不惧于此，“她步履轻盈却从容笃定地径直站到炮口正前方，利落叩击坦克装甲，如同叩门拜访”[3]，用自己的身体直面“坦克”的行为暴力，抵抗其在黑人社区散发的威胁，以此反抗白人政府强加给黑人集体自上而下的武装压迫，其“一脚踹开车门”[3]的举动也瓦解了“坦克”试图以主体之力摧毁梅丽迪安正义游行的意图，只能以“坦克里的男人窘迫地爬出来”[3]惨淡收场。尽管最终孩子们成功看到的“木乃伊女人”并不是真正的干尸，而是塑料假货，但梅丽迪安的行为在诉说着黑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坦克”通过发挥其主体性也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

白人市政官员在黑人社区修建的“蓄水池”是白人实权的产物，人类赋予它“蓄水”的功能，但未设置泄洪预警、防护堤坝，刻意将泄洪通道对准地势低洼的黑人社区。而当雨季来临时，“物”所具有的主体性使其挣脱人类的控制[12]，被动建造的“蓄水池”便主动施暴，“连绵大雨让蓄水池水位暴涨，多余的积水会毫无节制地四处漫溢”[3]，“蓄水池”嚣张地毁坏着黑人贫民区，使得黑人族群的生活雪上加霜，甚至“不少偷偷下水玩耍的孩童被突如其来的水流冲倒、溺水身亡”[3]，此时“蓄水池”不再是静态建筑，而是具备自主伤害能力的暴力主体，人们在“蓄水池”的恶劣行径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它便肆意妄为，开始反复夺走人的生命，“这样的悲剧年年上演”[3]也表明“蓄水池”成为给人们带来长期创伤的行动主体，而失去孩子的社区居民除了痛哭流涕、互相慰问以及指责谩骂白人市政委员之外别无他法。梅丽迪安作为民权运动的践行者，对“蓄水池”造成的恶果不可能视若无睹，而是倒逼她采取了极端的行动，梅丽迪安来到市政会议现场将因蓄水池导致的“开始腐坏的孩童尸体搁在市长的木槌旁”[3]，此种直接的非暴力抗议完全由“蓄水池”制造的悲剧直接驱动。而“蓄水池”所发挥的物质力量也促使梅丽迪安的反抗思想完成了关键转折，她逐渐认识到“蓄水池”的主体暴力根源，是掌权白人不受制衡的行政权力，而争取黑人自身的权益才是改善当前黑人苦难生存境遇的关键所在。因此，当社区居民想要以“梅丽迪安”来命名新生儿以示拥护时，梅丽迪安予以拒绝，“反倒让大家立下约定……

最基础的抗争方式，便是学会用好手中的选票”[3]。

“坦克”激发梅丽迪安用身体直面白人族群的种族歧视，“蓄水池”促使她以非暴力行为挑战白人权威，呼吁黑人居民重视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投票权”，展现出“物”的主体力量。

4 黑人教堂：本体觉醒

本体之物具有超越人类语言和文化表征的实在性，但“物”的实在性往往不在场[9]，是无限隐退的。而哈曼指出“物”分为“实在的物”“感性的物”“实在的特征”和“感性的特征”四个面向，我们可以在“实在之物”与“感性特征”的冲突中“瞥见物深不可测的实在性”[11]。

种族压迫体系固化了黑人教堂彩绘玻璃窗的“感性特征”，其形象一般是“面色苍白、身伴小羊的基督”[3]，呈现出温顺、隐忍的教化功能，而梅丽迪安在美国南方进行民权运动事业时，某天去的黑人教堂彩绘玻璃窗的图案竟是一个手持利剑的黑人男性形象，“手中握着一柄锃亮长刃，刃尖正不断滴落鲜血”[3]，这幅图案彻底颠覆黑人教堂传统的图像，而彩绘玻璃窗通过陌生化改造使得原本用于驯化黑人的教化功能彻底消解，“羔羊式顺从”的固有感性特征与“抗争勇士”图像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而“物”也只有通过“坏掉”这样的方式才能彰显其纯粹物质性[2]。因此“彩绘玻璃窗”作为透光客体的纯粹物质属性得以显露，作为纯粹的物质实在，无先天表意的限制，本身不受只能承载“温顺”形象的约束，而依托“彩绘玻璃窗”这一物质本体所描绘的黑人男性的抗争意象，开始让梅丽迪安意识到黑人教堂并不是维护种族压迫的附属品，或许可以从原来的信仰空间转变为民权运动的抗争阵地。

而很长时间以来，在种族秩序的规训下，黑人教堂里的圣歌也被赋予了刻板的“感性特征”，歌曲一般是舒缓柔和的音乐，主要用来辅助祷告，营造谦卑、忍耐的氛围。而在民权运动期间，梅丽迪安所去的一家黑人教堂的音乐发生了极大的反差。黑人教堂先是想起她熟悉的传统圣歌，但她只记得曲调，歌词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仿佛卡在记忆褶皱深处”[3]，圣歌的曲调脱离了梅丽迪安所熟知的意义系统，旧圣歌的原有功能已然失效，之后又一首“激昂近乎战歌的旋律掩盖了所有词句”[3]，彻底完成了陌生化转变。此刻，圣歌挣脱了只能“服务祷告，安抚人心”的感性特征，显露出人声、曲调作为声音载体的纯粹实在，它既可以承载黑人日常压抑的祷告，也可以唱响黑人在种族压

迫中所遭受的苦难，发出抗争呐喊。梅丽迪安“心神慢慢与这首带着悲壮抗争力量、仿佛蔑视死亡的乐曲融为一体”[3]，她开始放下黑人教堂旧式隐忍圣歌的执念，逐渐与黑人族群在白人压迫下无处宣泄的痛苦共情。

在黑人族群深受压迫的种族环境中，梅丽迪安对教堂向来没有好感，黑人教堂仪式也始终秉持着固定的“感性特征”，“逆来顺受的低声呢喃”[3]，“冗长乏味的布道，徒劳地期盼一切向好”[3]，仪式流程成为消减黑人反抗意志，促使其麻木顺从的“人造物”。而美国南方黑人教堂的这场仪式重构了所有环节：民众铿锵有力地应答、牧师模仿民族领袖马丁·路德·金呵斥种族压迫、在民权运动中牺牲少年的父亲在众人面前展露黑人族群所承载的集体伤痛、募捐资金救助遭受歧视的黑人囚犯、甚至号召黑人民众参与投票争取自身权益，教堂仪式原本单纯布道、祈福等功能瓦解，而它作为“事件之物”也脱离了人为施加的标签，而在固有的感性特征和后来抗争性仪式的冲突中，梅丽迪安窥见教堂仪式深不可测的实在性，由此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也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顿悟，“走在真正的革命者身后……待他们停下脚步清洗身上血污，喉咙被尸骸血腥味堵得无法歌唱时，我便走向上前，唱起刻在记忆里的歌谣，供他们重拾力量”[3]，以非暴力的方式继续在民权运动的道路上。

黑人教堂的彩绘玻璃窗、圣歌和教堂仪式在无限隐退中彰显出“物”的实在性，使梅丽迪安从固有的感性特征中逃脱出来，由此引发其最终觉醒。

5 结语

本文基于“物”叙事理论，通过蛇形土丘和旅居树两个“文化符号”，叙述了其长久以来承载的深受白人种族压迫的创伤历史，塑造了黑人女性梅丽迪安的生存环境；坦克和蓄水池发挥其“主体性”推动梅丽迪安在民权运动中进行现实反抗；最终，通过黑人教堂里的彩绘玻璃窗、圣歌以及教堂仪式所显露出的深不可测的“实在性”，导致梅丽迪安最终觉醒，在民权运动的道路上确立了自身身份。本研究跳出了传统非裔小说以“人”为中心的叙事框架，以“物”叙事黑人女性梅丽迪安从被压迫到反抗再到最终彻底觉醒的蜕变过程，不仅展现出“物”的力量所在，也为世界上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所面临的种族压迫等困境提供新的批判话语。

参考文献

- [1] Ansley F L. White Supremacy (And What We Should Do about It)[C]//Delgado R, Stefancic J. Critical White Studies: Looking Behind the Mirror.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7:592.
- [2] Brown B. A Sense of Things: The Object Matter of American Literatur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076317.001.0001>
- [3] Walker, Alice. Meridian [M]. New York: A Harvest Book Harcourt, Inc, 1976.
- [4] 方圆. 当代美国非裔小说的文学伦理学研究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4.
- [5] 傅修延. 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 [J]. 天津社会科学. 2021(5): 161-173. <https://doi.org/10.16240/j.cnki.1002-3976.20210513.001>
- [6] 郭海霞. 西进运动: 美国文学中的边疆书写与国家意识 [J]. 国外文学, 2024(4): 21-30. <https://doi.org/10.16345/j.cnki.cn11-1562/i.2024.04.010>
- [7] 韩启群. 西方文论关键词: 物转向 [J]. 外国文学. 2017(6): 88-99.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17.06.010>
- [8] 蒋翊遐, 侯仪聪. 鲍尔斯小说的后人类想象——以《困惑》的物叙事解读为例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25(5): 39-5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962.2025.05.004>
- [9] 师彦灵, 党梓月. 《他们携带之物》中“物”的创伤叙事 [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6): 98-104. <https://doi.org/10.3969/j.issn.2095-2074.2023.06.012>
- [10] 唐伟胜. 物性叙事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3.
- [11] 唐伟胜. “本体书写”与“以物观物”的互释 [J]. 中国文学批评, 2021(4): 110-120+158.
- [12] 于杰, 骆臻颖. 扎迪·史密斯《美》中的物叙事研究——以海地画作《情人爱尔斯利》为例 [J]. 江苏海洋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4): 77-86. <https://doi.org/10.3969/j.issn.2096-8256.2026.04.008>
- [13] 尹晓霞, 唐伟胜. 文化符号、主体性、实在性: 论“物”的三种叙事功能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9(2): 78-83. <https://doi.org/10.16482/j.sdwy37-1026.2019-02-008>
- [14] 张正春. 物叙事视域下的《野草在歌唱》 [J]. 社科论丛. 2024(2): 202-206.
- [15] 张志傲, 方英. “物”的力量:《外婆的日用家当》中的“物”本体叙事, 载《叙事研究》第5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4年版, 第189-199页.

作者简介

程秋月

2000年生, 河南商丘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英美文学.

E-mail: 1732286346@qq.com

彭石玉

1967年生, 湖南永州人, 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翻译与文化、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

E-mail: pengshiyu@wit.edu.cn